

# 斯诺护送邓颖超平津脱险记

赴宴遇到“李知凡太太”

1937年8月初的一天，斯诺收到居住在北平城郊的东北大学教授徐冰的夫人张晓梅女士托人送来的请柬，请他于次日中午务必去她家赴宴。斯诺知道徐冰教授是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其夫人张晓梅也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去年赴陕北苏区采访的介绍信就是徐冰让张晓梅转交给他的，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里，若没有重要的事情晤谈，他们是不会有这般闲情逸致举办什么家庭宴会的。于是，斯诺按约定的时间赶到徐冰教授家。在徐教授家的客厅里，斯诺看见一位身穿蓝色绸旗袍，戴一副深色墨镜的气质高雅的女士端坐在沙发上。女主人张晓梅向斯诺介绍道：“这位是李知凡太太。”

“李知凡太太？”斯诺对这个姓名很陌生，但见这位显然已化了装的太太的举止神态有些眼熟，却一时又想不起来。

“斯诺先生，你认不出我了吧？”李知凡太太爽朗笑道，说着便摘下墨镜。

“嗨！原来是邓颖超女士。”斯诺万万没有料到，大名鼎鼎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周恩来的夫人竟会出现在沦陷了的古都北平，惊诧得连连说：“真没想到！真没有想到！”

一年前，斯诺进入陕北苏区，在那里，他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长征到陕北后，本来身体就很瘦弱的邓颖超担任中共中央机要科科长兼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秘书，因工作紧张而导致肺结核病复发。当时，陕北苏区根本没有治疗肺结核的药物，饮食条件又差，弄得邓颖超天天发烧、咳嗽。随同斯诺一起到苏区的美国医学博士马海德大夫，为邓颖超仔细地检查了病情，临时采取了一个土办法，让她每天在院子里支一张行军床，躺在床上接受两个小时的日光浴。邓颖超按

照马海德的建议，每天躺在床上沐浴阳光，辅之药物治疗，几个月坚持下来，结果体温降了下来，初步控制住了病情的发展。

邓颖超告诉斯诺，西安事变后，中央批准她到外地疗养，由地下交通员将她护送到北平，住进西山福寿岭平民疗养院休养，为避人耳目，化名“李知凡太太”。在这里，她得到较好的饮食和充分的休息，加上药物治疗，病情大为好转。可自日本人占领北平后，常派兵借搜查抗日分子为由进行骚扰和捣乱，闹得平民疗养院里整日鸡犬不宁。

“你现在不能在这儿住下去了？日本人……”斯诺不无担忧地说。

“是的，我已接到中央通知，要我尽快离开北平返回陕北。”说到这里，邓颖超显得为难的样子，“想请先生将我送到天津，不知可否？”

“当然可以。”斯诺毫不犹豫地一口应承下来，他认为帮助中国革命者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况且邓女士还是他十分景仰的周恩来夫人。

**邓颖超扮成女仆离开北平**

当时，由北平至天津的铁路交通刚刚恢复，日军严密盘查过往旅客，搜捕抗日分子，对稍有怀疑的人立即扣留。像邓颖超这样的人物一旦被汉奸认出，那后果真不堪设想。

斯诺说：“此时日本人对在北平的西洋人尚不敢冒犯，我陪你去天津，你装扮成我家的女仆，我看还是可以安全通过的。”

斯诺当即把邓颖超由徐冰家接到他自己家中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们便去前门火车站预购下午的火车票。火车站人山人海，全是逃难的人群，卧铺、硬座、站票，任何票都一票难求。斯诺用手指搔搔头皮摇摇头，显得无能为力。正在这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武汉会见斯诺

1937年7月7日夜，美国作家、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的北平盔甲厂13号寓所里，刚刚写完《红星照耀中国》的最后一章，卢沟桥事变就发生了。7月29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后，大肆搜捕、迫害抗日爱国人士和革命青年。斯诺参加了在北平的欧美人士援华社会团体，积极掩护和帮助中国的爱国者免遭日军捕杀，斯诺将他们化装成乞丐、苦力或小贩，帮助他们逃出北平。在这期间，斯诺还掩护一位神秘的女士逃出了北平。

那个时候，见一个挂着军刀的日军少尉向他走来。出于新闻记者的职业本能，斯诺迎上去用英语跟那个日军少尉搭讪。

斯诺掏出一盒美国骆驼牌香烟并抽出一支递给那个日军少尉，日军少尉立马变得友好起来。日军少尉贪婪地吸着斯诺敬上的香烟，朝斯诺点头微笑，并伸出大拇指怪声怪调地说：“米(美)国的烟，大大的好！”

斯诺干脆将那盒香烟全塞到日军少尉的手里，日军少尉又竖起大拇指“米(美)国朋友，顶好、顶好的！”斯诺觉得求他帮忙的时机到了，便对他说：

“我是美国记者，要到天津去采访，请太君帮我买两张今天去天津的火车票。”

“好的，不成问题的！”日军少尉手一招，来了一个挂着中士领章的日本兵，便吩咐中士将斯诺领到售票处并售给他

两张去天津的火车票。

出乎斯诺的意料，竟这么顺当地搞到了火车票。

午饭之后，斯诺和邓颖超分乘两辆黄色包车向前门火车站而去。平日穿着随便不修边幅的斯诺，今日西装革履，头顶礼帽，打扮得衣冠楚楚。下车后，故意摆出一幅气宇轩昂的派头走在前面。邓颖超则装扮成女佣的模样，提着一个草编行李袋紧跟在斯诺的身后。

火车站进口，日军岗哨林立，虎视眈眈地监视着每一个旅客。斯诺大摇大摆地走进检票口，日军没有拦他，而跟在他后面的邓颖超却被拦住了。日本兵还要盘查，斯诺赶忙回转身子说：“我是美国人，她是我家女佣，跟我到天津去的。”日本兵只好放行。

斯诺和邓颖超一起登上列车，只见一节节车厢里全挤满了愁眉苦脸、闷不作声的难民。斯诺好不容易才在一节车厢里的一个旮旯里找到一个位置，让邓颖超挤坐上去，自己则在她旁边找了一个立足点，将行李包作为坐凳，坐在上面直喘粗气。车厢内数不清的头颅、胳膊和大腿立刻淹没了邓颖超的身影，通道上拥挤得一点缝隙都没有了，人们休想挪动一下身子。斯诺觉得，这样对邓颖超可能更安全，因为日本兵不可能在这拥挤得水泄不通的车厢里来回走动，逐个盘查旅客。虽然憋闷，气味难闻，好在平津这段路程不远，只要忍受两个小时的洋罪就可以抵达天津站。

斯诺觉得求他帮忙的时机到了，便对他说：“我是美国记者，要到天津去采访，请太君帮我买两张今天去天津的火车票。”

“好的，不成问题的！”日军少尉手一招，来了一个挂着中士领章的日本兵，便吩咐中士将斯诺领到售票处并售给他

斯诺将她送到英法租界区并找到他的好朋友，合众社的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爱泼斯坦也同样十分同情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他热情洋溢地要安排邓颖超在他家过夜。

在天津港，斯诺亲自送邓颖超上了轮船。临别时，邓颖超饱含热泪地对斯诺说：“斯诺先生，谢谢你的大力帮助。你也快点离开北平吧，在那里呆久了不安全。”

“不用担心，我会很快再去陕北的。你见到我妻子海伦时，请你告诉她。”此时，斯诺夫人海伦·斯诺正在延安采访。

黎明前，斯诺站在码头上不断地向邓颖超挥手，直到轮船驶入茫茫的大海。

轮船到了烟台，爱泼斯坦又由陆路将邓颖超送到济南，然后设法搞到赴西安的火车票，一直将邓颖超平安地护送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安排下，邓颖超很快便回到了陕北延安。

1938年7月在汉口，斯诺会见周恩来时便又和邓颖超重逢。周恩来一再向斯诺表示感谢，并设家宴招待斯诺，夫妇俩还与斯诺合影留念。

在日本侵略军的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斯诺对中国的抗战前途十分担心，便向周恩来请教对于这场中日战争前途的看法。周恩来便把毛泽东于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所作的《论持久战》的演讲文章的记录翻印稿送给斯诺。

1941年，斯诺回到了美国。他没料到，这一别，竟使他与中国隔绝了二十年。经过斯诺长期顽强的斗争，直到1960年才终于冲破了美国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得以重访中国，实现他与新中国总理周恩来夫妇欢聚于北京的愿望。

孟昭庚/文 据《党史博采》

# 靓女转让男友 只为彩礼一万

一对青年男女仓促订下婚约，然而，在以后的交往中，男方遭遇种种迷惑，女方经常带上闺中女友和其会面，致使双方恋爱半年之久男方都没有机会与女方亲近。就在男方提出结婚时，女友突然提出中止两人恋爱关系，要将男方“转让”给闺中女友，这是为什么呢？

见面半月就订婚

去年6月20日，正值早稻收割季节，22岁在晋江打工的李立明惦记老家15亩的稻子，便跟老板请了一个月的假。李立明乘坐长途客车，赶到县车站已是次日凌晨两点钟。此时不通班车，李立明便打电话通知弟弟骑摩托车来接他。

李立明刚与弟弟打完电话，就有一位女孩微笑着朝他走来。女孩也是从晋江过来的，跟他同乘一辆车。这位漂亮的女孩告诉李立明，她叫余霞，在晋江一家鞋厂打工，也是从厂里请了假回家帮父母收稻的。随后，两人开始谈各自打工的经历，谈得很投机。过一会儿，李立明的弟弟开着摩托到达车站，李立明建议余霞与他同坐弟弟的摩托回去。

到目的地，李立明把余霞送到她家，心里有种初恋的感觉。

分手时，双方互留了手机号码，都表示以后加强联系。第二天，李立明就收到余霞的一则短信，叫他有空去她家玩。过了三四天，余霞又给李立明打电话：“今天是我20岁生日，你能过来玩吗？”通过几天的短信、电话交流，李立明已经喜欢上余霞了。于是，李立明就去了余霞家。

余霞的母亲见了李立明，也显得特别高兴和热情。当天，余霞的母亲就对李立明说：“我看你跟我家余霞有缘，我们对你人品也满意，你回去跟你母亲捎个话，叫你家请媒人过来提亲……”

当天晚上，李立明回到家里，就把余霞家里人的意思告诉了母亲。两个星期后，按照农村风俗，李立明请了媒人前往余霞家为他提亲。经双方协商，确定男方送女方的礼金为两万元八千元。

2006年7月8日，是李立明和余霞的订婚日子。李立明向女方付了1万元钱礼金，女方请他请了一顿饭。这对相识才半个多月的年轻男女就这样按照当地风俗订下了婚约。

“电灯泡”电话求爱

2006年7月下旬，李立明和余霞一起赶回晋江上班。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余霞到李立明的住处来玩，还带来了一位和她年龄相仿的女孩。余霞向李立明介绍说，这个女

孩名叫汤梅，是她的同事。

交谈中，李立明了解到，汤梅中专毕业，在厂里当质检员，是个活泼开朗的女孩，是余霞“未来的嫂子”。余霞二哥也在她们同一家工厂当主管，他看中了汤梅，整整追了她三年。但是两人关系时好时坏，若即若离。

此后，余霞每个星期日都来李立明的住处玩，令李立明不能接受的是，她每次来都要带上汤梅。

两个月下来，李立明在女友身上又花了4000多元钱。然而，李立明与余霞订婚3个多月，他却连女友的嘴唇都没有吻过，这让他心里很愤愤不平。

2006年12月的一天，汤梅突然给李立明打来电话，汤梅在电话里支支吾吾地问李立明：“立明，其实我已经喜欢上你了，就是不知道你到底喜不喜欢我？”李立明说：“我们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我已经跟余霞订婚了，何况即使我能接受你的感情，余霞也不能答应。我不能做现代的陈世美！”

然而，汤梅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却让李立明目瞪口呆：“你不知道吧，其实余霞对你根本没有好感，她是为了她二哥的婚事，家里缺钱才和你订婚的。她每次与你约会都带上我，目的就是不给你亲近她的机会，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还不明白？”

放下电话，李立明来到了余霞厂里，找到了余霞。李立明

转弯抹角地说：“余霞，我父母对我们俩的关系比较担心，想在新年春节将我们婚事给办了，不知你有什么意见？”

余霞犹疑着，过了好一会儿才回答说：“我总觉得我们之间了解不够，新年春节马上到了，马上就结婚未免太快了吧！”余霞的话让李立明心里一阵发虚。

**新婚之夜她不肯同房**

2007年春节快到了，回家的前一天晚上，李立明再次找到余霞，对她说：“我们还是春节结婚吧，当初订婚时你妈也有这种意思！”余霞听了还是说：“太快了吧，再过两年吧，趁我们年轻，多挣点钱！”李立明诚恳地说：“既然你从来就没有打算跟我结婚，我也不好勉强你，你将我送你的那一万元礼金还给我吧，让我对父母有个交代！”

余霞说：“订婚半年来，我觉得我们两人不合适，为此我心里一直觉得过意不去，一直在给你物色合适的人。我发现汤梅是真心爱你的，你跟汤梅也很般配，她已经明确向你求爱了，就算我把你转让给她，你送给我家的那1万元礼金，也算是付给我的转让费。”

由于李立明不同意将自己转让给汤梅，余霞只好妥协，同意跟李立明回家结婚。于是两人双双回到了抚州老家。一听说女儿回家结婚，余霞母亲就要李立明凑齐订婚时所欠下的18000元礼金。于是，李家人七

拼八凑总算凑齐18000元钱给了余家。2007年2月5日，李立明和余霞领取了结婚证。

2007年2月10日，是李立明与余霞新婚的大喜日子。当夜，李立明和余霞入了洞房。然而，当李立明试着解开余霞的腰带时，余霞却紧紧地护住裤子，惊恐地说道：“别动我，我好害怕，我怕痛。”李立明尊重妻子，新婚之夜，他们相安无事。此后，李立明每次向余霞提出性要求时，妻子都以“害怕痛”为由拒绝。

半个月后的一天，李立明从县里干完装修活儿回来，进屋没有见到余霞，到处找她也没见到她的人影，一拉开抽屉，李立明才发现余霞留下的纸条，她告诉李立明，她听人说，初性交会很痛，因此她非常惧怕过性生活。

**丈夫拒绝转让告妻子**

当夜，李立明打通她的手机，才知道余霞离开家独自去了晋江。

一个星期以后，余霞的二哥把她送回了家，告诫她不要再出来，安心和丈夫过日子。又过了几天，余霞提出到娘家住些日子，李立明同意了。没过几天，余霞打电话叫李立明去她家接她回家。然而，回到家里没过几天，余霞说她要去乡里买东西，便从李立明手里拿走摩托车的钥匙，然后骑着摩托车出了村。可是，妻子出去后到傍晚五点多钟还没回来，李立明打她手机也关机。李立明又到

乡里去找，路上才碰到村里的一个老人，老头将摩托车钥匙交给李立明说：余霞已经坐长途客车去了晋江，摩托车锁好放在了乡信用社里。

李立明去晋江寻找妻子。寻找了五天五夜，路费花了上千元，也没有她的音信。回到家后，人财两空的李立明，于5月15日，一纸诉状将妻子告到当地法院。要求法院判决夫妻离婚，余霞返还28000元结婚礼金。法院开庭时，余霞从晋江赶了回来，经法院调解，李立明和余霞都同意离婚。

然而，在法庭上，双方对退还28000元的礼金发生了争议。余霞再次提出将丈夫转让给闺中女友汤梅，她认为，这是一桩两全其美的事，她既不需要退还礼金，李立明也能找到一个真心爱他的女人，她不明白李立明为什么要告诉她！

余霞的话让法官哭笑不得。余霞见“转让”不成，又不承认收了李立明28000元的礼金，她说她只收了李立明一万元的礼金。因为后补交的18000元的礼金，李立明没有通过媒人、而是直接交给余霞母亲的，如今余霞不承认，也让李立明有苦难言。

2007年9月21日，金溪县人民法院就李立明诉余霞的离婚纠纷一案做出判决：准许原告李立明与被告余霞离婚，由被告余霞返还原告李立明礼金10000元。

(文中人物为化名；谢转载、上网) 许建平